

陕 西 师 范 大 学 学 术 文 库

宋史新探

● 李裕民 著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陕西师范大学学术文库

宋史新探

李裕民 著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代号:ZH138100

宋史新探

李裕民 著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安市陕西师大 120 信箱 邮政编码 710062)

新华书店经销 陕西潼关县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3.5 插页 4 字数 314 千

1999 年 1 月第 1 版 199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200

ISBN 7-5613-1906-1/K·96

定价:16.00 元

开户行:西安工行小寨分理处 账号:216-144610-44-815

读者购书、书店添货或发现印刷装订问题,请与发行科
联系、调换。

电话:(029)5251046 5233753

前 言

我和宋史结缘,屈指算来,也快40年了。1959年,我考上杭州大学历史系,有幸认识了宋史专家徐规先生,他是史学家张荫麟先生的高足,治学严谨,擅长考据,尤爱奖掖后学,在他的指点下,我走上了研究宋史之路。

1963年,国家首次公开招收研究生,我考上了北京大学历史系研究生,从宋史权威邓广铭师深造。先生博大精深的学问,高明独到的治学方法,非常严格的要求,开阔我视野,鞭策我前进,受益匪浅。没想到,正当毕业之际,一场空前的文化浩劫来临,打乱了宁静有序的生活。

1968年,我被分配到山西大学,专业书在浩劫中损失殆尽。当时“文革”红潮一浪高似一浪,但我深信学术迟早会复兴,于是利用博物馆资料,秘密钻研古文学,1973年,我发表第一篇论文,国内外的师友们都没有想到,它竟是古文字领域的。

80年代,我去北大拜访邓师,邓师当着顾颉刚大师的面,夸我“成绩卓著”,我不好意思地说“离经叛道了”。1984年,我赴杭州参加宋史研究会,从此才把主要精力逐渐转向宋史。

在这以前,我多少也作过一些宋史研究工作,1978年到1983年间,发表宋史论文7篇,点校出版宋人笔记《青箱杂记》(中华书局,1983年)。1984年以后有了较大变化,发表宋史论文70多篇,点校《东轩笔录》(中华书局,1985年),辑佚并点校两种宋人笔记《杨文公谈苑》、《倦游杂录》(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3年),发现并校注了《司马光日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与佐竹靖彦教授合编《增广司马温公全集》(1993年,日本汲古书院)。

我的兴趣广泛,宋史之外,兼及中国古代史其他各代、古文字、历史文献学、地方史志、历史地理、道教史等,在这些领域中发表130篇论文,出过10本书,其中有的书,如《四库提要订误》(书目文献出版社,1990年),70%以上与宋代典籍有关。涉及面广,精力必然分散,因此,我这些有限的宋史研究成果,在一生倾注于宋史事业的导师面前,颇感惭愧。这次选出部分论文编成一书,只是想总结一下以前的历程,鞭策自己今后拿出更多更好的成果来。

这本论文集,大体以政治、经济、军事、宗教思想、家族人物、古籍、学术争鸣为序,共22篇。

第一组,政治方面的论文3篇。《赵匡胤是怎样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的》,旨在揭示陈桥兵变之奥秘。赵匡胤既已掌握军队,为何不直接将小皇帝拉下马,却要假传情报,到陈桥驿搞兵变呢?原来后周吸取自己夺权的经验教训,建立两支平行的军队,互相牵制,赵匡胤只掌握其中一支,因此密谋策划半年,把军队全弄到手,才发动政变。宋又以此为戒,将军队分成三支,从此,宋代再也没有发生类似的政变。《揭开“斧声烛影”之谜》,说明太祖是被太宗谋害的。《宋神宗制造的一桩大冤案——赵世居案剖析》,说明此案乃是太祖、太宗两系后裔为争夺帝位而斗争的产物,与斧声烛影有密切联系。

第二组,经济论文1篇。《北宋前期方田均税考》,论述王安石变法前的历次方田均税法,王安石的方田均税法乃是对前法的继承和发展。

第三组,军事方面的论文2篇。《宋太宗平北汉始末》,北汉

是十国中最后灭亡的割据政权,它与中原交战最多,战事也最惨烈,此战尚无人研究,故撰本文,以补空白。《方腊起义考辨》考证七个问题:方腊演说辨伪,方腊不是喫菜事魔教起义,方腊姓名考,方腊是佣人不是保正,方腊起义人物传,响应方腊起义的各支义军,方腊杀人考辨。

第四组,宗教与学术思想论文4篇。《吕洞宾考辨》,旨在揭开神仙的面纱,还他历史的本来面目,并辨明《钟吕传道记》非唐人施肩吾所作,乃是金代的作品。《论宋初的佛教政策》,说明宋既不佞佛,也不灭佛,它采取了保护、利用,又严加管理、限制的政策。《北宋王朝与五台山佛教》,指出两者有很特殊的关系,太祖时,五台山僧正参与北汉政权,与宋相抗。太宗灭北汉后,转而投宋,宋则给予支持,同时设五台山寺务司,加以管理。徽宗时,曾一度压抑。钦宗时则参与抗金。其地位仅次于东京大相国寺,而高于天台、峨嵋、庐山。《论宋学精神及相关问题》,论证宋学的主干是程朱理学而非新学,宋学精神是独立精神、自由思想,并探索宋学精神产生的原因、影响及局限性。

第五组,家族与人物5篇。《折氏家族研究》,考察折氏家族的兴起,抗击北汉、辽、夏、金,直到衰亡的历史,论述其承袭府州和知州的特点,宋廷对折氏的政策以及折氏的经济、家风、婚姻、丧葬的特点。《杨家将史事新考》分6部分:杨业籍贯考,杨业生年考,北汉时杨业抗辽为主说辨误,杨业修建边寨考,杨六郎考,折太君考。《刘恕年谱》是我最早撰写、历时最久、字数最多的文章,原为1963年本科毕业论文,先后经徐规师、邓广铭师审阅,后又作增订,于1978年发表,今又作较大修改与补充。《郭若虚的家世与生平》,郭若虚是中国美术史上的名人,但他的家世与生平,《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即说“莫之详也”,各美术史也未能详述,此文可补其缺。《沈括的亲属、交游及佚著》分五部分:沈括

的亲属,沈括与王安石的关系,《灵苑方》的著作年代及佚文,《清夜录》的著作及佚文,《忘怀录》辑佚。

第六组,古籍5篇。《梦溪笔谈与沈括良方研究》,考定《笔谈》的两种本子及《补笔谈》的成书年代,订正《笔谈》记载之误,辑录《笔谈》佚文,并探索《良方》著作年代及来源。《司马光日记考》,此日记是我于1992年在日本内阁文库发现的,国内外几十家报刊作过报导。此文所考为:撰写时间、目的和版本,真伪,价值及缺点。《手录》,附《司马光手录佚文一则》是对本文的补充。《增广司马温公全集考》,此书仅见于日本内阁文库,本文考其中刻印与流传,内容与价值。《宋诗话丛考》,是为订补郭绍虞《宋诗话考》而作,所考诗话29种,其中6种为郭书所缺收。《十六种宋人笔记成书年代考》,考证北宋笔记6种:《归田录》、《春明退朝录》、《青琐高议》、《东斋记事》、《澠水燕谈录》、《龙川略志》。南宋笔记10种:《默记》、《春渚纪闻》、《铁围山丛谈》、《能改斋漫录》、《挥麈录》、《夷坚志》、《容斋随笔》、《老学庵笔记》、《游宦纪闻》。

第七组,学术争鸣2篇,《宋代经济史质疑》,对漆侠教授代表作《宋代经济史》中的三个问题:土地兼并、人口、寺观,发表了不同意见,邓广铭师对此文评价甚高。《匡缪辨误端正学风》是为答复漆教授门生高纪春对我《司马光日记校注》的批评而作。

回想本世纪历程,前半个世纪产生过一批史学大师,后半个世纪却没有,这是令人遗憾的。原因何在,值得探索,我想缺乏正常的学术批评当是原因之一。文革结束前,谁跟形势就出名,谁有不同意见,就挨整。文革后,特别是近十年来,又盛刮吹捧风,评职称、评奖,没有好书评是上不去的,于是这股风愈刮愈烈,几大杂志联合创议也不见效。长此下去,学风堕落,前境堪忧。

要真正扭转吹捧风,一要改变凭书评上职称、得奖的制度;

二是知名学者应该带头欢迎批评。可惜迄今未见有人在这两方面着力。有鉴于此,1996年,我这个小学者在《中国经济史研究》上发表文章,对一位有名的漆侠教授的代表作提出批评意见,随后漆侠三弟子发表《驳议》,另一门人在《历史研究》上发文批我的《司马光日记校注》,尽管这中间有许多不正常现象,如漆本人不站出来答辩,而门人文章酷似大字报,宋史年会论文集不予采用,却可以上《历史研究》,等等,这阵批评风总算刮起来了。至于不正常的现象可以通过批评、反批评得到纠正,想将批评者涂黑,以掩饰自己的丑陋,恐怕不会奏效。漆教授不是很尊敬导师邓广铭先生吗?邓先生说我那篇文章好,漆教授和弟子说糟,邓师能在争辩中发现错了立即承认,弟子为什么就不能继承这优良作风呢?这大概就是我们这一代人与老一辈的差距所在。

我喜欢争鸣,爱订正古、今学者的失误,也极愿意他人订我之误,只有纠正错误才能得到真理。文学批评能促使文学繁荣,史学繁荣也需要靠史学批评去推动。我希望报刊、杂志多登批评文章,同时也要刊登反批评文章,什么时候学者不分大小,都可以互相批评,好朋友也可以互相批评,把吹捧风挤得无容身之地,什么时候就有正常学风了。这次批评风由我引发,我很高兴,只要能盛行开来,受点压力、付点代价,算不了什么,我仍会一如既往,争鸣下去,只要对史学发展有益。

今年,邓广铭师不幸仙逝,谨以此书的出版作为纪念。

最后,要感谢陕西师范大学校领导和历史系领导的关怀和资助,感谢陕西师大出版社的热心支持,没有他们玉成,这本书是很难问世的。

李裕民

1998年4月15日于西安

目 录

1. 赵匡胤是怎样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的 (1)
2. 揭开“斧声烛影”之谜 (16)
3. 宋神宗制造的一桩大冤案——赵世居案剖析 (30)
4. 北宋前期方田均税考 (47)
5. 宋太宗平北汉始末 (65)
6. 方腊起义考辨 (82)
7. 吕洞宾考辨——揭示道教史上的谎言 (121)
8. 论宋初的佛教政策 (136)
9. 北宋王朝与五台山佛教 (147)
10. 论宋学精神及相关问题 (159)
11. 折氏家族研究 (168)
12. 杨家将史事新考 (198)
13. 刘恕年谱 (224)
14. 郭若虚的家世与生平 (263)
15. 沈括的亲属、交游及佚著 (274)
16. 《梦溪笔谈》与沈括《良方》研究 (290)
17. 《司马光日记》考 (311)

附：司马光《手录》佚文一则	(323)
18.《增广司马温公全集》考	(326)
19. 宋诗话丛考	(341)
20. 十六种宋人笔记成书年代考	(363)
21.《宋代经济史》质疑	(377)
22. 匡缪辨诬 端正学风——答高纪春对我《司马光 日记校注》的批评	(399)

赵匡胤是怎样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的

周世宗显德六年(959年)六月十四日,赵匡胤就任殿前都点检,十九日,世宗卒。第二年正月四日,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黄袍加身,建立了长达300多年的宋王朝。事实看起来很简单,却存在许多值得深思的问题。

一、赵匡胤是怎样夺取政权的

这里旨在探索下述问题:

1. 赵匡胤在周世宗去世时,具备哪些足以夺取政权的条件,是什么原因使他没有在世宗新丧之际夺权,而拖了半年之久才动手?

2. 殿前司的衙门就在宫城左掖门旁,为何赵匡胤不直接发动宫廷政变,却采用陈桥兵变的方式?

3. 长期担任殿前司最高统帅之职的张永德,为什么不能东山再起,直至夺取政权?

4. 侍卫亲军司的统帅李重进,拥有比赵匡胤更大的兵权,为何不去夺取政权,或有效地阻止赵的夺权?

要回答这些问题,必须客观地分析一下周世宗去世前、去世时和去世后的形势。

周世宗在位时期(显德元年正月至六年六月)

后周军制和后汉相比,有一个很大的变化,即新设殿前司,与侍卫亲军司分掌全国兵权。郭威是在侍卫亲军司的高、中级将领支持下夺取政权的,为了防止有人蹈袭他的故伎,于广顺二年(952年)创建了殿前司,任命外甥李重进担任殿前都指挥使,其地位低于侍卫亲军马步军都指挥使,下辖铁骑左右两厢骑兵,控鹤左右两厢步兵。每厢各二军,共2万人。人数不多,战斗力颇强,是一支中央警卫部队,地位至为重要。

侍卫亲军司最高统帅为侍卫亲军马步军都指挥使,次为副都指挥使、都虞候。下设龙捷马军都指挥使,统率骑兵,虎捷步军都指挥使,统率步兵。马步军均分左右两厢,各设都指挥使,厢下设军。厢的编制远比殿前司大,王彦升于广顺元年末任龙捷左第九军都虞候,^①可见龙捷一厢至少有九个军。张铎在后汉末任奉国(后周改称虎捷)右第六军都指挥使,^②韩通于汉末任奉国左第六军都校,^③可见虎捷一厢至少有六个军,每军2500人,虎捷十二军3万人,龙捷十八军45000人,侍卫亲军司总兵力至少为75000人,如按《武经总要》前集卷1《军制》和卷2《日阅法》所载宋制“十军为厢”计算,则侍卫亲军司的总兵力为10万人。郭威为帝时,王殷任侍卫马步军都指挥使,他赴大名就任天雄军节度使,“以侍卫司局从,凡河北征镇有戍兵处,咸禀殷节制”,“有震主之势”。^④广顺三年(953年)冬,郭威患病,害怕王殷接管政权,设计将他处死,改任李重进为侍卫亲军马步军都虞候,统率侍卫司,又任命驸马张永德为殿前都指挥使,统率殿前司。

两司实力不同,官员级别也有高低,殿前司的都指挥使略低于侍卫司的马步军都虞候,这由李重进从前者晋升为后者可以

推知,殿前司的副手都虞候则低于侍卫司的厢都指挥使,这由殿前都虞候韩令坤因功升为龙捷左厢都指挥使可以推知。^⑤聂崇岐将殿前都虞候与侍卫都虞候并称为高级将领,^⑥显然是不正确的。

周世宗显德元年(954年)三月,后周与北汉在高平决战,殿前司兵马居中,侍卫亲军司兵马分居左、右两翼,其右翼军一触即溃,幸亏殿前司军奋战,才反败为胜。战后,世宗处死逃将70余人,改派殿前司的一些将领充实到侍卫司。十月,世宗对军队作了一番整顿,他命令殿前都虞候赵匡胤负责挑“选武艺超绝者,署为殿前诸班,因是有散员、散指挥使、内殿直、散都头、铁骑、控鹤之号”^⑦。此时,精选的皇帝近卫班直也归殿前司管辖,其数量可能与宋初相当,约数千人,和殿前司军合计,将近3万人。世宗又命李重进将侍卫司中“老弱羸小者去之”,世宗曾说“侍卫兵士,累朝以来,老少相半,强懦不分”,^⑧则所淘汰的兵士数目不少,侍卫司的人数可能下降到6万人左右,与殿前司兵力之比缩小到二比一,但战斗力则比原来有所提高,《旧五代史》称“诸军士伍,无不精当”,当去事实不远。

殿前司的实力加强了,张永德的地位并没有提高,而李重进则在显德元年七月由都虞候升为都指挥使。更使张永德难堪的是,显德三年(956年)正月,当他随同世宗讨伐南唐时,李重进被任命为淮南道行营招讨使,成为这次战争中的最高军事指挥官,在恼怒、妒嫉、争权的心理驱使下,张永德经常向部下散布李重进的坏话,甚至派亲信密告世宗“重进有奸谋”,世宗很了解李的为人,没有理睬此事。李则考虑两人不和已严重影响军心,在当年八月,单骑往永德帐中,向张敬酒,表示诚意。世宗采取搞平衡的手法,于十二月十四日,特设殿前都点检一职,由张永德担任。这样,张的地位就和李相当了。张留下的空缺,则命赵匡

胤担任。平心而论,李、张的矛盾,曲在张,攻南唐的战功,李大于张,世宗的处理方法不是太公道的。从心理状态分析,世宗是多疑的,谣言造多了,他即使不信,也得有所防范。显德四年六月,他得知濠州刺史齐藏珍曾游说过李重进,便找个借口,将齐杀了。这一切自然会激起李对张的仇恨。显德六年(959年)五月,世宗北征契丹的返京途中,在供军之物中收到一木片,长二三尺,上面画了许多卦,卦旁均题“点检做”;^⑩一说木片是从四方送上的文书中发现的,上题“点检作天子”,^⑪这显然是李重进一伙搞的鬼。六月十五日,世宗在病情加重之际,下令免去张永德殿前都点检之职,改任澶州节度使,并任赵匡胤为殿前都点检。

周世宗去世之日

六月十九日,周世宗去世,此时的形势是:

1. 客观形势,主少国疑。世宗之后符氏六月九日才册封,年仅二十三、四岁,没有任何政治斗争的经验和力量。

2. 赵匡胤的个人条件,他在高平之战与淮南战场的功绩已充分证明有着卓越的军事才能,殿前都点检一职,使他掌握了数万精兵。然而要搞政变,仅有这两个条件是不够的,张永德也曾有过这些条件,周世宗一纸命令,便剥夺了他的实权。郭威政变成功的主要因素是高中级禁军将领的支持,尤其是把兄弟“十军主”的拥戴,^⑫从基层逐次上升的赵匡胤正有一帮把兄弟,号称“义社十兄弟”,其中最出名的有石守信、王审琦、李继勋三人,其次有韩重赟、杨光美(杨美)、刘廷让,《宋史》中均有传。他们都是汉乾祐时投入郭威帐下的,结为兄弟,当在此时,结拜时需刺臂出血宣誓:“凡我十人,龙蛇混合,异日富贵无相忘,苟渝此言,神降之罚。”郭威十兄弟结拜仪式即如此。^⑬经过几年的奋战,到

世宗卒时,石守信任殿前都指挥使,王审琦为右厢都校,李继勋为战耀左厢都部署,权知邢州(他在显德三年六月任侍卫步军都指挥使,后因淮南战争失利,降职),韩重赉为控鹤军都指挥使,刘廷让为铁骑右厢都指挥使,杨美为铁骑都指挥使。此外,尚有赵匡胤“尝拜为兄”的赵彦徽,官虎捷右厢都指挥使。^⑬与赵匡胤之父有宗盟之份的赵晁,官河阳节度使。^⑭这些人已是高、中级将领,手中掌握实权,他们希望从政变中得到更大的好处。

赵匡胤自显德三年(956年)以来,先后网罗了一批人才,成为自己的智囊团。著名的有赵普(922~992年),是个颇有心计的小知识分子,显德六年为赵匡胤幕下的掌书记。^⑮吕余庆(927~976年),显德三年,赵匡胤闻余庆有才,奏为从事。^⑯刘熙古(903~976年),博通经史,是赵匡胤幕府中文化水平最高的人,任建德军节度判官。^⑰沈义伦(909~987年),精通三礼,善于理财,任观察推官。^⑱赵匡胤帐下还有一位都押衙李处耘(920~966年),史称其“善谈当世之务,居常以功名为己任”,是一个有谋略、有胆识的武将。^⑲

3. 赵匡胤搞政变的阻力也很大。最主要的阻力来自侍卫亲军司,都指挥使李重进是周太祖的外甥,能征惯战,握有重兵。副都指挥使韩通,有勇寡谋,誓死效忠周室。潞州的节度使李筠,居潞(今长治)八年,在镇“擅用征赋”,养兵3万,几乎是雄镇一方的割据势力。^⑳步军都指挥使袁彦,也是与赵为敌的大将。^㉑

此外,尚有不少中间势力,如引进使曹彬等,^㉒宰相范质、王溥,枢密使魏仁浦,与赵匡胤、李重进均无特殊关系。

总之,周世宗去世之时,赵匡胤虽有政变的实力,但反对势力甚强,而赵的准备不足。赵在登上最高军阶之前,有两大统帅在前挡道,尚无发动政变的想法,就任殿前都点检离世宗死才四天,即使有政变的心理,也仅在萌发阶段。

恭帝在位时期(显德六年六月二十日~七年正月四日)

恭帝即位后,赵匡胤开始作政变准备,第一个重大行动在七月十七日,以侍卫步军都指挥使袁彦为陕州节度使,解除了他在侍卫司中的军职,侍卫马军都指挥使韩令坤为侍卫马步军都虞候,龙捷左厢都指挥使高怀德升为侍卫马军都指挥使,虎捷左厢都指挥使张令铎升为侍卫步军都指挥使。

第二个重大行动在七月十九日,以侍卫马步军都指挥使李重进为淮南节度使,让他去路途遥远的扬州当节度使,保留军职。

这两个行动将侍卫司中的两名主要实权派排挤出去,由于两人改任节度使,李尚保留军职,比张永德稍强,他们还能接受新命,而韩通等人职务未动,不会对这些行动有更多的猜疑。新升官的三人中,高、张是赵匡胤的密友,韩则属中间势力,与此同时,王审琦也由铁骑右厢都指挥使升为殿前都虞候。^②

何以见得这些行动出自赵匡胤的旨意?首先,应当看到这不是周世宗的旨意,如是世宗旨意,一定会在六月十五日解除张永德军职时解决,或者在次日的人事更动中发布新命。也不可能是遗诏,遗诏不会拖一个来月,更不会分几次宣布。其次,这不是宰相范质等人的旨意,范等没有介入这两股军人势力,没有必要发布厚此薄彼的命令。当然也不会是七岁小皇帝的旨意。剩下只有赵匡胤一种可能性了。赵本人无权发布这种命令,但他有一个特殊的条件,符太后与赵匡义(宋太宗)的妻子是亲姐妹,他完全可以通过太后的口达到自己的目的。

现在,再来具体考察一下二司实权派的状况。殿前司的前四位人物是:

殿前都点检赵匡胤、殿前副都点检慕容延钊、殿前都指挥使

石守信、殿前都虞候王审琦。

以上四人中，赵、王、石是盟兄弟，慕容延钊（913～963年），与赵关系不错，赵“常兄事延钊”^④，他不是赵的集团成员，对赵发动政变，未必赞同。赵匡胤在政变前将他打发到澶州任镇宁军节度使，军职不变。

殿前司厢级指挥官四人，知其姓名者二人：

铁骑右厢都指挥使刘廷让、控鹤右厢都指挥使马全义均为赵匡胤的心腹。至此，殿前司可以说已成为赵匡胤发动政变的大本营了。

侍卫亲军司的前五号人物是：

马步军都指挥使李重进、马步军副都指挥使韩通、马步军都虞候韩令坤、马军都指挥使高怀德、步军都指挥使张令铎这五人中，李已打发到扬州，高、张是赵匡胤集团的要员。韩令坤（923～968年），与赵匡胤关系亲密，但不是赵集团中人。赵为了保险起见，于显德六年冬，让他去河北防守“北边”。^⑤这样，在京的侍卫司里效忠周室的只剩下韩通一人了。

厢一级的统帅有：龙捷右厢都指挥使祁廷训、虎捷左厢都

指挥使张光翰、虎捷右厢都指挥使赵彦徽

张、赵是赵匡胤集团中人，祁是“临事多规避”的胆小鬼，^⑥他不入伙，也不妨事。至此，侍卫司除了韩通以外，大体上也被赵的势力控制了。

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问题，赵匡胤不能越过韩通，直接指挥侍卫司的军队；而如果不直接掌握这支军队，韩通运用他的合法权力，组织反抗，政变就会出现流产的危险。

如何逾越这个障碍？赵匡胤和他的智囊们都会记得九年前发生的一件大事：